DOI:10.16363/j.cnki.xyyj.2002.01.008

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“西域传”所见西域诸国的社会生活

余太山

关键词：社会生活　西域　两汉　魏晋南北朝
中图分类号：K294.5　**文献标识码**：A　**文章编号**：1002－4743（2002）01－0056－10

关于西域诸国的衣食住行，正史“西域传”只有极其简略的记载。兹辑录有关记载，并说说这些记载涉及的一些问题。

（一）衣冠服饰

一、塞种和乌孙

1.《汉书·西域传》载，休循国“民俗衣服类乌孙，因畜随水草，本故塞种也”。又载，捐毒国“衣服类乌孙，随水草，依葱岭，本塞种也”。这似乎说明乌孙之衣服有类塞种。盖据同传：

> 昔匈奴破大月氏，大月氏西君大夏，而塞王南君罽宾。塞种分散，往往为数国。自疏勒以西北，休循、捐毒之属，皆故塞种也。

又载，乌孙国“本塞地也，大月氏西破走塞王，塞王南越县度，大月氏居其地。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，大月氏徙，西臣大夏，而乌孙昆莫居之，故乌孙民有塞种、大月氏种云”。既然在《汉书·西域传》描述的年代，乌孙的居地是原来的塞地，乌孙之民包括原来的塞种，则乌孙的衣服受塞种影响以致类塞种是完全可能的。更何况，“乌孙”与塞种诸部之一的Asii不妨视为同名异译，乌孙和Asii本来可能是同源异流的关系。

2.《汉书·西域传》又载，无雷国“衣服类乌孙，俗与子合同”。这说明无雷国也与塞种有关。盖据同传：“蒲犁及依耐、无雷国皆西夜类也。”“西夜”与“塞”其实是同名异译。[①]《汉书·西域传》所谓“西夜与胡异，其种类羌氐行国”，应该是种类融合的结果。

3.《汉书·西域传》又载，尉头国“衣服类乌孙”。这可以视为尉头国与塞种有关的一条证

① 参看余太山《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“西域传”所见西域族名、国名、王治名》，载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238－251页。

据。盖“尉头”与塞种诸部之一 Asii 是同名异译。[①]

4.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载，奄蔡国“民俗衣服与康居同”。据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，奄蔡与康居均为行国，属水草迁徙，民俗衣服应该相同。[②] 不仅如此，两者都曾经是塞种部落，一度共居塞地，相互影响是难免的。[③]

《晋书·西戎传》载，康居国“衣服略同大宛”，似乎其时康居已经土著化，其实不然。这是传文混淆康居传和粟弋传而造成的误解。“衣服略同大宛”的应该是粟弋，而不是康居。[④]

二、车师诸国

车师诸国在古代西域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，遗憾的是对于他们的衣冠服饰可以说没有什么记载。惟一的一条是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所载移支国人“皆被发”。盖据同传，“前后部及东且弥、卑陆、蒲类、移支，是为车师六国。”而“移支国居蒲类地。……随畜逐水草，不知田作。所出皆与蒲类同”。知所谓移支与蒲类一样，原来亦车师之一支。一说传文仅仅记载移支人“被发”，说明其余车师部落皆不“被发”。[⑤] 今案：此说未必然。[⑥]

一则，所谓“被发”其实很可能指“辫发”。《周书·突厥传》：“其俗被发”。其实突厥是辫发的。不管移支作为车师的一支，原来的族属如何，他们“被发”或“辫发”乃接受北方游牧部族影响的可能性不能排除，车师诸部多在天山以北，同样可能接受这种影响。

二则，南北朝史籍载高昌国（前身为车师前国高昌壁）人“辫发”，说明山南的车师人一样可能接受北方民族的影响。

三则，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编者称所撰乃“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”，《汉书·西域传》未及车师诸国发式，按理应该叙及，只字不提，如果不是疏忽，只能认为是没有资料。否则，便是移支的发式可以视作车师的代表。因此，没有理由从移支“被发”而推论其余车师诸国“剪发”。

三、其它城郭诸国

《汉书·西域传》于西域南北道诸国的衣冠服饰几乎没有留下记载。《晋书·西域传》以下也只有简单的几则：

1. 焉耆：《晋书·西戎传》载“其俗丈夫剪发，妇人衣襦，着大袴”。《魏书·西域传》则载，“丈夫并剪发以为首饰”。

2. 龟兹：《晋书·西戎传》载龟兹国“男女皆剪发垂项”。

3. 于阗：《梁书·西北诸戎传》载于阗国“王冠金帻，如今胡公帽。与妻并坐接客。国中妇

---

① 见余太山前揭文。

② 康居西北为奄蔡，也是一个行国。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称，奄蔡后改名“阿兰”。据《魏书·吐谷浑传》，“［吐谷浑］北又有阿兰国。与鸟兽同，不知斗战，忽见异人，举国便走。土无所出，大养群畜。体轻工走，逐之不可得。”

③ 参看余太山《塞种史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2 年，第 118－130 页。

④ 参看余太山《塞种史研究》，第 102－104 页。

⑤ 白鸟库吉《亚细亚北族の辫发に就いて》，《白鸟库吉全集》卷五，东京，岩波，1970，pp. 231－301，esp. 273－280.

⑥ 参看嶋崎昌《姑师と车师前·后王国》，《隋唐时代の东トゥルキスターン研究》，东京，1977 年，第 3－58 页。

人皆辫发，衣裘袴”。①

4．渴盘陁：《梁书·西北诸戎传》载其人“衣古贝布，着长身小袖袍，小口袴”。②

5．高昌：《梁书·西北诸戎传》载，高昌人“辫发垂之于背，着长身小袖袍、缦裆袴。女子头发辫而不垂，着锦缬缨珞环钏”。《周书·异域传》则载高昌“服饰，丈夫从胡法，妇人略同华夏”。

按此，西域南北道各国主要的发式有二：辫发和剪发。

于阗之辫发，一说乃受藏族之影响，高昌之辫发，乃受北方部族之影响。

剪发，一般认为是伊朗之风，焉耆、龟兹等剪发之人，若非本身有类似伊朗人之血统，便是受其影响。

焉耆、于阗、渴盘陁、高昌诸国均着袴也是值得注意的。尽管式样各不相同，但都是游牧风俗无疑。

四、悦般和嚈哒

《魏书·西域传》载，悦般国“［或仿］胡俗剪发齐眉，③ 以醍醐涂之，昱昱然光泽”。“或仿”两字非常重要，应该补入。由此可知悦般习俗中伊朗之风并非原有，而是西迁后所染。

《魏书·西域传》又载，嚈哒国“衣服类［胡］，加以缨络。头皆剪发”。《周书·异域传》则载，嚈哒国“其俗又兄弟共娶一妻，夫无兄弟者，其妻戴一角帽；若有兄弟者，依其多少之数，更加帽角焉”。《梁书·西北诸戎传》载滑国“人皆善射，着小袖长身袍，用金玉为带。女人被裘，头上刻木为角，长六尺，以金银饰之”。这一服饰与嚈哒一妻多夫婚俗有关。④ 至于剪发，无疑是其人西迁后受萨珊波斯影响使然。

又，《梁书·西北诸戎传》载呵跋檀国，“亦滑旁小国也。凡滑旁之国，衣服容貌皆于滑同。”今案：据同传，被称为“滑旁小国”的，除呵跋檀外，尚有周古柯和胡蜜丹两国。其中胡蜜丹，应即《魏书·西域传》所见钵和，据载，其人“服毡裘”。

五、波斯

1．《梁书·西北诸戎传》载波斯婚姻法曰：“下聘讫，女婿将数十人迎妇，婿着金线锦袍，师子锦袴，戴天冠，妇亦如之。”

同传还记载位于波斯东界的末国“土人剪发，着毡帽，小袖衣，为衫则开颈而缝前”。

今案：《梁书·西北诸戎传》所载波斯国很可能不是萨珊波斯，⑤ 所述衣冠服饰自然也可能与萨珊波斯无关。

2．《周书·异域传》载：“王姓波斯氏。坐金羊床，戴金花冠，衣锦袍、织成帔，皆饰以珍珠

---

① 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五：“从捍麼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，至于阗国。王头着金冠，似鸡帻，头后垂二尺生绢，广五寸，以为饰。威仪有鼓角金钲，弓箭一具，戟二枝，槊五张。左右带刀，不过百人。其俗妇人袴衫束带，乘马驰走，与丈夫无异。”

② 王国维：《胡服考》，《王国维学术随笔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154－160页，指出“魏周之际，又以袴褶之大口广袖者为不便，而复狭小之，以为戎衣”。

③ 据《通志·四夷三》（卷一九六）、《太平寰宇记·四夷十五·西戎七》（卷一八六）改补。参见内田氏《魏书西域传原文考释（中）》，《东洋史研究》30卷第2期（1971），第82－101页。

④ 关于嚈哒的一妻多夫婚俗见余太山《嚈哒史研究》，齐鲁书社，1986年，第26－27页，第155—156页。

⑤ 参看余太山《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地望》一文（待刊）。

宝物。其俗：丈夫剪发，戴白皮帽，贯头衫，两厢近下开之，并有巾帔，缘以织成；① 妇女服大衫，披大帔，其发前为髻，后被之，饰以金银华，仍贯五色珠，络之于膊。”

今案：“坐金羊床，戴金花冠”，据考证应是贵霜－萨珊朝统治者的服饰，此处误以为是萨珊国王的服饰。② 金花一说是莲花，③ 一说是 artichoke（Cynara scolymus）。④

六、大秦

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于所谓大秦国有非常详细的记载，但是于该国人民的衣冠服饰几乎没有留下有价值的记录。仅有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所载“皆髡头而衣文绣”，以及《魏略·西戎传》“似中国人而胡服”寥寥数句而已。“衣文绣”或“胡服”皆笼统之言。“髡头”似与当时罗马人习俗不合。⑤

（二）饮　食

按之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，西域诸国可大别为土著和行国，其饮食习惯似也可随之分为两大类。前者以谷类为主，后者以畜产为主。

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以下记“土著”诸国时多称“田稻”、“田稻麦”或“种五谷”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载细君公主歌称乌孙“以肉为食兮酪为浆”，则是行国典型的饮食。

土著之国不仅需要谷食，也需要食肉饮乳，故诸国也多有“畜产”；同样，畜牧为主要生计的诸国也不能没有谷食。故《汉书·西域传》载“随畜牧逐水草”的鄯善国“寄田仰谷旁国”。又据《梁书·西北诸戎传》，定居的高昌，“备植九谷，人多噉麨及羊牛肉”；游牧的滑国“有五谷，国人以麨及羊肉为粮”。⑥

至于西域诸国的饮料，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以下记载最多的是“蒲陶酒”：

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载，大宛国“有蒲陶酒”；又载：“宛左右以蒲陶为酒，富人藏酒至万余石，久者数十岁不败。俗嗜酒。”同传还载安息国有“蒲陶酒”；知所谓“宛左右”包括安息在内。

“蒲陶酒”的主要原料是“蒲陶”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载且末国、难兜国、罽宾等国有“蒲陶诸果”。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则载粟弋国出“蒲萄众果，其土水美，故蒲萄酒特有名焉”。据《梁书·西北诸戎传》，高昌国有“蒲陶酒”、于阗国产“蒲桃”。就现有的记载而言，种植“蒲陶”，饮“蒲陶酒”者均为定居民，无一例外。《晋书·西戎传》称，康居国有葡萄，其实这是传文混淆有

---

① “织成”之后应据《太平御览》卷七九四补“锦”字。

② 关于金羊床，见田边胜美《ローマと中国の史书に秘められたクシャノ·ササン朝》，《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》124（平6），第33－101页。

③ Herzfeld. E., *Kushano－Sasanian Coins*, *Memoir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* No. 38, Calcutta, 1930.

④ A. D. H. Bivar, "*The Kushano－Sassanian Coin Series*", *Journal of the Numismatic Society of India* No. 18 (1956), *pp*. 13－42.

⑤ D. D. Leslie and K. H. J. Gardiner, *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*, Roma, 1996, p. 48, 113.

⑥ 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五载，朱驹波国“人民山居，五谷甚丰，食则面麦，不立屠煞。食肉者，以自死肉”。似乎是饮食受宗教信仰的影响。

关栗弋国的记载导致的错误。

最后，《汉书·西域传》载罽宾国“好治食”，“冬食生菜”，所谓“生菜”无非是新鲜蔬菜而已，盖据同传罽宾国气候“温和”，冬季亦不乏供应。①

（三）城郭、宫室和住宅

一、据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，大宛国“有城郭屋室，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”；安息国“城邑如大宛。其属大小数百城”;② 大夏国“有城屋，与大宛同俗"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和同书“张骞李广利传”所载大宛、安息、大夏诸国城邑情况与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略同。大宛等国都是土著。

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载同为“土著”的天竺即身毒国“有别城数百"。《魏书·西域传》则载南天竺国“有伏丑城，周帀十里，城中出摩尼珠、珊瑚。城东三百里有拔赖城，城中出黄金、白真檀、石蜜、蒲萄”。

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又载大秦国“地方数千里，有四百余城。……以石为城郭。……所居城邑，周圜百余里”。《晋书·西戎传》载大秦国“有城邑，其城周回百余里”。《魏书·西域传》于“大秦条”仅载“其王都城分为五城，各方五里，周六十里”。③

同传“伏卢尼国条”载伏卢尼国“都伏卢尼城，……累石为城”。一说伏卢尼城应即安条克城。④ 但“累石为城”云云可与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关于“条支国城在山上，周回四十余里”的记载参看。换言之，伏卢尼城实际上是安条克城的外港 Seleucia 亦未可知。⑤

《周书·异域传》称波斯国“治苏利城，……城方十余里”。⑥ 结合《魏书·西域传》和《隋书·西域传》的有关记载，此处所载应即萨珊波斯都城。《梁书·西北诸戎传》所谓波斯国“国有城，周回三十二里。城高四丈，皆有楼观。城内屋宇数百千间，城外佛寺二三百所”云云，则未必指萨珊波斯都城。⑦

按照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的标准，天竺、大秦和波斯，都是土著。

城郭的建制，大多语焉不详。惟据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，李广利伐大宛之际，“围其城，攻之四十余日，其外城坏，虏宛贵人勇将煎靡。宛大恐，走入中城。”这说明大宛都城有内城和外

---

① 《旧唐书·西域传》称罽宾国“草木凌寒不死”，徐松《汉书西域传补注》卷上引以诠释“生菜”；然《旧唐书》与《汉书》之“罽宾”似非一地。

② 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称：“初，汉使至安息，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。东界去王都数千里。行比至，过数十城，人民相属甚多。”

③ 白鸟库吉《大秦传に现はれたる支那思想》，《白鸟库吉全集》卷七，东京，岩波，1971 年，第 237－302 页，esp. 271－278，以为分为“五城”之类说法均出诸汉人的想象，并无事实为依据。

④ 关于伏卢尼国，参看白鸟库吉《拂菻问题の新解释》，《白鸟库吉全集》卷七，第 403－596 页，esp. 433－438.

⑤ 余太山《塞种史研究》，第 187－191 页。

⑥ Hirth, “*The Mystery of Fu－lin*”, *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*, XXXIII, 1913, pp. 197－198, note 3, 4；宋岘《弗栗恃萨傥那、苏剌萨傥那考辨》，《亚洲文明》第 3 集，安徽教育出版社，1995 年，第 193－201 页。

⑦ 参看余太山《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地望》一文，待刊。

城。① 还说明大宛国的城郭（特别是其都贵山城）十分坚固，已经有较高建筑水平。

但是，当时大宛人尚不知掘井。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载“宛王城中无井，皆汲城外流水，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”。李广利“决其水源，移之，则宛固已忧困”。据同传，大宛国后因“新得秦人，知穿井”，“秦人”一般认为指中国人。

二、据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，乌孙“与匈奴同俗”，自然包括居住情况。具体而言，就是《汉书·西域传》所谓“穹庐为室兮旃为墙”。

和乌孙一样，哌哒即滑国也是典型的行国。《魏书·西域传》载哌哒国“无城邑，依随水草，以毡为屋，夏迁凉土，冬逐暖处。分其诸妻，各在别所，相去或二百、三百里。其王巡历而行，每月一处，冬寒之时，三月不徙”。《梁书·西北诸戎传》亦载滑国“无城郭，毡屋为居，东向开户”。

然据《汉书·西域传》，“大昆弥治赤谷城”；又载康居国内有卑阗城。这说明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所谓行国同样有城郭。

骑马游牧部族一旦进入农耕区，就很可能走向定居，于是有定都之类举措。明显的例子如大月氏。当它刚刚迁入阿姆河流域之际，设王庭于河北，显然没有都城，其庐帐而居的情形可以想见。但到《汉书·西域传》的时代，据载已有王治曰“监氏城”了。哌哒的情况也一样。据《周书·异域传》，哌哒“王治拔底延城，盖王舍城也。其城方十余里”。②

但是，一旦遭外敌入侵，已有的城郭也可能失去，例如《魏书·西域传》载，乌孙国因屡遭柔然侵扰，不得已西徙葱岭山中，“无城郭，随畜牧逐水草”，赤谷城显然已经放弃。

三、塔里木盆地周围所谓“城郭诸国”，或以田作为主，或以畜牧为主，然多有城郭。

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首载“楼兰、姑师邑有城郭”。在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描述的时代，姑师和楼兰无疑以畜牧为主。

楼兰即后来的鄯善，《汉书·西域传》载其“王治扜泥城”。《周书·异域传》载其城“方一里”。

姑师为车师之前身，盖其人后来自盐泽北迁，分为数国，占有天山南北一些绿洲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载其中的车师前国王治“交河城”。

据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，“贰师将军既西过盐水，当道小国恐，各坚城守，不肯给食。攻之不能下。下者得食，不下者数日则去。”知不仅大宛国贵山城十分坚固，绿洲诸国的城郭也未必不堪一击。同传载汉臣之言“皆有城邑，兵弱易击”，不完全正确。《魏书·西域传》称：“于阗去京师几万里，蠕蠕之性，惟习野掠，不能攻城，若为所拒，当已旋矣。虽欲遣使，势无所及。显祖以公卿议示其使者，亦以为然。”这也说明同样的问题。

《汉书·西域传》所传塔里木盆地周围诸国王治大多称“城”。王治是绿洲诸国的政治、经济中心。据《晋书·西戎传》，龟兹国“俗有城郭，其城三重”。③《梁书·西北诸戎传》也说龟兹“城有三重，外城与长安城等”；《周书·异域传》载龟兹国“所治城方五六里”，均见城郭之规模。

① 《释名·释宫室》：“郭，廓也，廓落在城外也。”

② 参看余太山《哌哒史若干问题的再研究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》第1集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1，第181－211页。

③ 《晋书·吕光载记》龟兹“宫室壮丽，命参军京兆段业著《龟兹宫赋》以讥之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绿洲国的城郭往往还不止一个。明显的例子如《周书·异域传》载，于阗国“所治城方八九里，部内有大城五，小城数十”；焉耆国“部内凡有九城”。车师前国之地有高昌壁，后来发展成高昌国，《周书·异域传》又载高昌“国内总有城一十六”。①

四、《汉书·西域传》载有一些王治以“谷”为名的小国，例如：蒲类国（王治疏榆谷）和东西且弥国（王治于大谷和兑虚谷），很可能并无城郭可言。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载东且弥国“庐帐居，逐水草……所居无常”，又载蒲类国“庐帐而居，逐水草”，似可为证。

然同传又载若干山居之国亦有城郭。如：乌秅国“山居”，“王治乌秅城”；山国“民山居”，据《水经注》卷二（河水），可知其“王治墨山城”。②

据《魏书·西域传》，其人“居山谷间”、“山居”或“依托山谷”者有伽倍、折薛莫孙（赊弥）、钳敦、弗敌沙、阎浮谒、朱居、波知等国。前五国据同传，亦均有都城。其详情不得而知，传文提到的仅仅是钵和即伽倍“其土尤寒，人畜同居，穴地而处”。③ 后两国中，朱居即悉居半，其前身为《汉书·西域传》之子合，据称，王“居呼犍谷”，则当时似乎并无都城。④ 至于波知，据传文“土狭人贫”，有无都城，不得而知。

五、以畜牧为主的绿洲国即使有城郭，可能还保留着毡帐而居的习俗。如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载，永兴元年，因更立阿罗多为王，将前此而立的车师王卑君，“以后部人三百帐别属役之，食其税。帐者，犹中国之户数也。”

土著则多有居室，如《汉书·西域传》载，罽宾国“其民巧，雕文刻镂，治宫室”，而乌弋山离国亦有与罽宾相似的“宫室”。即使山居之乌秅国人，同传也称其“累石为室”。

南北道城郭诸国中，宫室之壮丽首推龟兹国。《晋书·西戎传》载，其“王宫壮丽，焕若神居”；《梁书·西北诸戎传》称其“室屋壮丽，饰以琅玕金玉”。

此外，《魏书·西域传》载，阿钩羌国“居止立宫室”；副货国“国中有副货城，周币七十里。……国王有黄金殿，殿下金驼七头，各高三尺”。

又有《梁书·西北诸戎传》载，高昌国“其地高燥，筑土为城，架木为屋，土覆其上”；于阗国“有屋室市井。……王所居室，加以朱画”。

至于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载大秦国“城中有五宫，相去各十里。宫室皆以水精为柱”；《魏略·西戎传》载大秦国“其王治滨侧河海，以石为城郭。……以水晶作宫柱及器物”；《晋书·西戎传》亦载大秦国“屋宇皆以珊瑚为棁栭，琉璃为墙壁，水精为柱础”；似乎传说的成份居多。

---

① 关于高昌国的城邑，参见嶋崎昌《高昌国の城邑について》，《隋唐时代の东トゥルキスターン研究》，第113-147页；侯灿《麴氏高昌王国郡县城考述》，《高昌楼兰研究论集》，新疆人民出版社，1990，第73-84页。

② 至于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所载被匈奴迫徙而“逃亡山谷闲”原蒲类国人，大概就不会有城郭了。

③ 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五载：“九月中旬入钵和国，高山深谷，崄道如常。国王所住，因山为城。人民服饰，惟有毡衣。地土甚寒，窟穴而居。风雪劲切，人畜相依。国之南界有大雪山，朝融夕结，望若玉峰”。又载，朱驹波国即朱居国“人民山居”。

④ 但据《大唐西域记》卷十二，斫句迦“国大都城周十余里，坚峻险固”；斫句迦，一般认为应即悉居半。或者《魏书·西域传》没有关于悉居半国都城的明确记载（仅言“治呼犍”），说明在传文描述的时代还没有如此规模之都城。玄奘所见“坚峻险固”的都城可能是就地取材，累石而成。

（四）交通工具

一、马：西域产善马，不言而喻，无论行国、土著，主要交通工具都应该是马。各传屡见诸国产马的记载，如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载大宛国“多善马”；《汉书·西域传》载乌孙国“多马”；《魏书·西域传》载波斯国“土出名马及驼，富室至有数千头”等等；乃至里程也以“马行”天数计算。如《汉书·西域传》载姑墨国“南至于阗马行十五日”之类。

值得注意的是《晋书·西戎传》关于大宛国“与人马乘不调坠死者，马主出敛具”的记载。这似乎说明马作为交通工具可以租用。

二、驴和橐驼之类家畜。例如：《汉书·西域传》鄯善国“有驴马、多橐它（驼）”；《魏书·西域传》载哌哒国“多驼马”；又载万度归伐龟兹国，“大获驼马而还”。

有趣的是《魏书·西域传》载乌苌国“西南有檀特山，山上立寺，以驴数头运食，山下无人控御，自知往来也”。

三、乘象：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载天竺国“乘象而战”；又载东离国“乘象、骆驼，往来邻国。有寇，乘象以战”。《魏略·西戎传》则载车离国乘象、橐驰以战。《周书·异域传》载波斯国“战并乘象”。

四、车：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载安息国“临妫水，有市，民商贾用车及船，行旁国或数千里”。

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载大秦国“乘辎軿白盖小车，出入击鼓，建旌旗幡帜”，《魏略·西戎传》、《晋书·西戎传》所载略同。

《魏书·西域传》载哌哒国“其国无车有舆”，似乎应该是“无车舆”或“有车无舆”之讹。录以备考。

五、船：如前所引，临妫水的安息国用船经商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载“从鄯善傍南山北，波河西行至莎车，为南道”。既然“波河”，自然有船。

临海之国，自然更需要船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称“自条支乘水西行，可百余日，近日所入云”。虽然有浓厚的传说色彩，当时已有可用于远航的海船，似无可疑。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载和帝永元九年，班超遣甘英因使大秦而抵条支。“临大海欲度，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：海水广大，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，若遇迟风，亦有二岁者，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。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，数有死亡者。英闻之乃止。”亦可为证。

六、其它交通工具：绳索和铁锁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载“县度者，石山也，溪谷不通，以绳索相引而度云”；《魏书·西域传》则载阿钩羌国“国西有县度山，其间四百里中，往往有栈道，下临不测之渊，人行以绳索相持而度，因以名之”。又载赊弥国“东有钵卢勒国，路崄，缘铁锁而度，下不见底”。①

七、驿传：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载张骞首次西使，大宛“为发导绎，抵康居，康居传致大月氏”。这是有关西域驿传的最早记载。

《汉书·西域传》载“自乌孙以西至安息，近匈奴。匈奴尝困月氏，故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到

① 《洛阳伽蓝记》载：“十一月中旬入赊弥国。此国渐出葱岭，土田峣崅，民多贫困。峻路危道，人马仅通。一直一道，从钵卢勒国向乌场国，铁锁为桥，悬虚而度，下不见底，旁无挽捉，倏忽之间，投躯万仞，是以行者望风谢路耳。”

国，国传送食，不敢留苦。及至汉使，非出币物不得食，不市畜不得骑，所以然者，以远汉，而汉多财物，故必市乃得所欲”，也是同一时期西域有驿传之证。

明确的驿传记录则见诸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，大秦国内“列置邮亭”，“邻国使到其界首者，乘驿诣王都”；又载“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，人庶连属，十里一亭，三十里一置，终无盗贼寇警”；以及《魏略·西戎传》：“其制度，公私宫室为重屋，旌旗击鼓，白盖小车，邮驿亭置如中国。从安息绕海北到其国，人民相属，十里一亭，三十里一置，终无盗贼。但有猛虎、狮子为害，行道不群则不得过”。一说虽然罗马、安息均有驿传，设 Serai 供队商止宿，但并非“十里一亭，三十里一置”，这些具体的描述大致是以汉土的制度为蓝本加以理想化的，不可全信。

（五）医　药

一、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载西夜国“地生白草，有毒，国人煎以为药，傅箭镞，所中即死”。今案：此“白草”应即“独白草”。[1]

二、同传又载于阗国有“胡医”能使毒药。

三、《魏书·西域传》载龟兹国“其国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，行数里入地，如餅餬，[illegible]齿已落者能令更生，病人服之皆愈”。同传又载悦般国“其国南界有火山，山傍石皆燋镕，流地数十里乃凝坚，人取为药，即石流黄也”。案：龟兹西北大山中所出，应即悦般国人取以为药之石流黄。[2]

四、同传又载“真君九年，遣使朝献。并送幻人，称能割人喉脉令断，击人头令骨陷，皆血出［淋落］[3]，或数升或盈斗，以草药内其口中，令嚼咽之，须臾血止，养疮一月复常，又无痕瘢。世祖疑其虚，乃取死罪囚试之，皆验。云中国诸名山皆有此草，乃使人受其术而厚遇之”。此幻术辅以医术。

（六）娱　乐

一、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载条支国“善眩”。又载安息国曾“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”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所载略同。“眩人”应即《后汉书·西南夷传》所载大秦“幻人”。盖据《魏略·西戎传》，大秦国“俗多奇幻，口中出火，自缚自解，跳十二丸巧妙”。今案：眩人或幻人应来自黎轩即埃及的亚历山大城。[4] 当时黎轩是大秦属地，故黎轩幻人亦被称为大秦幻人。

又如前引《魏书·西域传》所载悦般国亦有幻人，与海西幻人异曲同工。

二、珍玩：《魏书·西域传》载万度归破焉耆国“获其珍奇异物及诸委积不可胜数”。[5]

---

① 独白草药效见《本草纲目》卷一七下。

② 石流黄药效见《本草纲目》卷一一。

③ 据《太平御览》卷七三七补。

④ 前引 D. D. Leslie and K. H. J. Gardiner 书，pp. 150－152，222－223。

⑤ 《魏书·食货志》：“……其后复遣成周公万度归西伐焉耆，其王鸠尸卑那单骑奔龟兹，举国臣民负钱怀货，一时降款，获其奇宝异玩以巨万，驼马杂畜不可胜数。度归遂入龟兹，复获其殊方瓌诡之物亿万已上。”

三、音乐：《周书·异域传》载，焉耆国“俗尚蒲桃酒，兼爱音乐”。

四、女市：《魏书·西域传》载，“俗性多淫，置女市，收男子钱入官。”

（七）节　日

一、《周书·异域传》载，焉耆国“俗事天神，并崇信佛法。尤重二月八日、四月八日，是日也，其国咸依释教，斋戒行道焉”。据《荆楚岁时记》，“二月八日，释氏下生之日，迦文成道之时，信舍之家建八关斋戒，车轮、宝盖、七变八会之灯，平旦，执香花绕城一匝，谓之行城。”又据《荆楚岁时记》“四月八日，诸寺设斋，以五色香水浴佛，共作龙华会”。两者均佛教节日。①

二、《周书·异域传》又载，波斯国“以六月为岁首，尤重七月七日，十二月一日，其日，民庶以上，各相命召，设会作乐，以极欢娱。又每年正月二十日，各祭其先死者”。今案：波斯新年在夏至日，即六月二十一日。又，“七月七日”和“十二月一日”之节日可能指乞寒戏。此戏分别在夏季和冬季举行。据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卷四一，“苏莫遮，西戎胡语也。正云飒磨遮。此戏本出西龟慈国，至今犹有此曲，此国浑脱、大面、拨头之类也。或作兽面，或像鬼神，假作种种面具形状。或以泥水沾洒行人，或持羂索、搭钩捉人为戏。每年七月初，公行此戏，七日乃停。土俗相传云：常以此法攘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”；而据《旧唐书·中宗纪》，景龙三年（709）十二月“乙酉，令诸司长官向醴泉坊看泼胡王乞寒戏”。所述龟兹乃至中国的乞寒戏源出波斯。②“七月初”或者就是“七月一日”，“十二月乙酉”虽非十二月一日，但无妨视两者同源。至于正月二十日“祭其先死者”，是什么性质的节日，有待考证。③

（八）小　结

一、各史“西域传”关于西域诸国衣食住行等的记载颇为疏略，但多可印证，是可信的。

二、有关记载着眼点与其说是西域诸国衣食住行本身，不如说是与华夏的异同。

三、葱岭以西诸国的有关记载较为详细，这也许和中原王朝徕远人、致殊俗的西域经营观念有关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）

责任编辑：刘国防

---

① 《俱舍论法宝疏》卷一：“略有二理，以立正异故，婆罗门国以建子立正，此方先时以建寅立正。建子四月，即建寅二月，故存梵本者而言四月，依此方者，即云二月，根本一也。”《大正大藏经》卷四一，页四五三上。

② 向达：《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》，三联书店，1957年，第71－75页；岑仲勉：《隋唐史》，中华书局，1982年，第676页；韩儒林：《泼寒胡戏与泼水节的起源——读史随笔》，载《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》，新疆人民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100－103页；姜伯勤：《敦煌宗教艺术与礼乐文明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537－539页。

③ 关于萨珊波斯的节日，参看 Yarshater，E.（ed.），*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*，Vol. 3－（2），*The Seleucid*，*Parthian and Sasanian Periods*，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，1983，p. 813.